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术著作

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 (1905~1949) 中编

Evolution of Kuomintang's Political and Social Structures
(1905~1949)II

崔之清/主编

- 1927~1937
 - 政治理念之退化
 - 训政体制的出台
 - “九·一八”事变后的体制变异
 - 党务工作的整顿与重建
 - 组织结构之定型
 - 社会结构的分化



D693.74

26:2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术著作

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

(1905 ~ 1949) 中编

Evolution of Kuomintang's Political and Social Structures
(1905 ~ 1949) II

崔之清/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 录

导 言	1
-----------	---

上编 1905 ~ 1927

第一章 中国同盟会的政治与社会结构	23
一 同盟会的创立及其政治理念	23
二 革命时代同盟会上层的政治与权势冲突	51
三 中国同盟会的组织演变与社会构成	78
四 后期同盟会的政治运作与组织发展	108
第二章 国民党·中华革命党的结构嬗变	133
一 民初国民党的政治与社会结构	133
二 中华革命党的政治与社会结构	176
第三章 三民主义：从创新到混乱	226
一 三民主义的推陈出新	226
二 三民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升华	249
三 国民党政治理念的混乱	277

第四章 权力结构与组织流变：从整合到分裂（上）	308
一 孙中山整合国民党	308
二 国民党“一大”时期的政治结构分析	349
三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上层权力结构的动荡	389
第五章 权力结构与组织流变：从整合到分裂（下）	414
一 国民党的公开分裂	414
二 蒋介石图谋专制与党内反蒋运动的兴起	477
三 从同盟会成立到国民党改组后的政治学检讨	555
第六章 中国国民党早期党员规模与党务经费考察	571
一 中国国民党早期党员规模考察	571
二 中国国民党早期党务经费考察	608

中编 1927 ~ 1937

第七章 政治理念之退化	637
一 三民主义的变质	637
二 “以党治国”理念的成型	652
三 愚民教化之一：力行哲学	665
四 愚民教化之二：新生活运动	679
五 法西斯主义声浪的高涨	698
第八章 训政体制的出台（1927 ~ 1931）	714
一 “训政”名义下的“以党治国”	714
二 五院制的建立及运行	719
三 训政架构下的党政关系	730

四 派系冲突与武力统一	738
第九章 “九·一八”事变后的体制变异	760
一 蒋汪合作与共治	760
二 权力结构的调整	769
三 纷争与整合之分析	777
四 走向独裁体制	782
五 特务组织的泛滥	789
六 重拾保甲制	794
第十章 党务工作的整顿与重建	800
一 “清党”与整理党务	800
二 党员总登记（1928～1930）	808
三 党务工作的系统化与制度化	821
四 地方党务的不平衡发展	831
五 党务经费之分析（1927～1937）	840
第十一章 组织结构之定型	852
一 中央权力结构：决策系统	852
二 中央权力结构：执行系统	870
三 地方权力结构：垂直形态	898
四 地方权力结构：平行形态	928
五 中央与地方：整合与反整合	950
第十二章 社会结构的分化	961
一 上中层群体：革命精英官僚化	961
二 党员群体：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型	1030

三 官僚化与大众化的悖论	1061
--------------------	------

下编 1937 ~ 1949

第十三章 战时政治理念调整	1067
一 适应战时体制	1068
二 固化政治合法性	1079
三 强化“党国”原则	1099
四 “以军治党”的意义	1116
五 适度的政治开放	1125
第十四章 战时组织结构变化	1141
一 党团并举的矛盾	1141
二 党务系统的运作模式	1160
三 派系的整合与分化	1213
四 党政军一体化	1243
五 体制腐败的端倪	1270
第十五章 战时群体结构嬗变	1282
一 精英党？大众党？	1282
二 群体素养的升降	1302
三 经费与待遇的考察	1319
四 离合的双向效应	1333
第十六章 战后政治理念蜕变	1347
一 “六大”决议的实质	1348
二 民主还是集权	1358

三 “革新运动”兴衰	1379
四 “以军治党”再强化	1393
第十七章 战后组织结构病变	1399
一 党团合并的无奈	1399
二 系统精简与功能退化	1418
三 组织痼疾公开化	1462
第十八章 战后群体结构恶变	1480
一 群体离心与组织溃瘍	1480
二 精英阶层的背离	1496
三 政治合法性丧失	1509
结语：关于国民党结构史的若干思考	1523
参考文献	1580
一 中文、日文著作	1580
二 民国报刊	1607
三 英文资料	1608



中 编

1927 ~ 1937

第七章 政治理念之退化

1927年春夏之交，中国国民党背叛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实行“清党”，国民革命的形势骤然逆转。在此后的10年间，国民党内部各派相互倾轧，纷争不断，军阀之间的混战也此起彼伏，使得国民党几次处于严重分裂之中。同时，国民党对内还加紧了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对外则由于没有采取积极的抵抗政策，使得大片国土沦丧，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革命形势逆转的同时，国民党的政治理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蜕变。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将孙中山三民主义儒学化，使之降格为个人独裁的工具；强调“以党治国”理念，以确立和固化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确立力行哲学为国民党官方哲学，并发起新生活运动，以推行愚民教化；此外，蒋介石为了达成个人独裁，还曾推崇和鼓吹过法西斯主义。

一 三民主义的变质

如前所述，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势力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了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解释，并将它作为自己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这既是获得政治合法性的重要筹码，更是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有力武器。翻开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在国民党内

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时候，关于主义的争论也必然格外的喧嚣。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国民党内各派对权力的追逐更趋激烈，而关于主义的纷争则达到新的高潮。在这一过程中，胡汉民与蒋介石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

（一）胡汉民将三民主义诠释为“清党”反共的理论武器

这一时期，胡汉民关于三民主义的解释紧密配合了国民党“清党”反共。蒋介石与胡汉民在“清党”问题上态度基本一致，但二者在最初的侧重点有所区别。蒋介石重在武力扑杀和武装“围剿”，充满了相当浓厚的血腥味道；胡汉民在充当蒋介石反共盟友的同时，将主要精力置于“共产党思想之清除”。^①

这与胡汉民的特殊身份密切相关。胡汉民是国民党的元老，长年追随孙中山左右，是孙中山的主要政治继承人之一。但胡汉民的追随者主要为一批政客，而无实际武力可倚重，因此，他希望借助蒋介石的军事实力，达成其“清党”分共的目的。后来他曾谈起与蒋联合的动机：“我当时从苏俄回国，在上海从事著述，十六年春，共产党在武汉益形猖獗，一批莫名其妙的同志，还曲解其所谓总理的三大政策，高唱着联俄和容共，党亡国危，很多同志来找我商量大计。我在苏俄六月，深知苏俄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便坚决说，非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反共清党不可……我才入了南京，在党务政治方面，帮各同志的忙，彻底反共。”^②蒋介石“清党”反共，当然需要打出三民主义的旗号，但以他

① 须力求：《胡汉民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第223页。

② 胡汉民：《党权与军权之消长及今后之补救》，《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6期，1933年6月15日。

的资历和理论水准，难以服人。胡汉民则是“三民主义的理论家、宣传家”，非常熟悉孙中山的著作，这一时期曾潜心研究过三民主义，并试图将三民主义诠释为“清党”反共的理论武器。胡汉民因此成为蒋介石的盟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的时候，胡汉民身居要职，同时担任宁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务。^①他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后发布的“秘字第一号命令”即是“通缉共党首要”，实行“清党”分共，明令缉拿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等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其他著名社会活动家共190余人。

胡汉民“此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努力清党和宣传反共工作”。“当时清党工作，特重共党思想的清除，所以反共宣传列作首要”，胡汉民“因此为文演讲，手口不歇，特别以青年为对象”，“所有《三民主义之认识》、《清党的意义》、《CP的手段和策略》、《青年的烦恼与出路》，以及《国民党民众运动的理论》，都是先生当年反共理论名作，这都是先生倡导反共的结果”。^②对于清党，胡汉民的态度非常坚决。他在《清党的意义》一文中，毫不掩饰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们能容忍这个破坏本党，牺牲国家，欺骗农工，背叛主义，只顾争夺私人权利的中国共产党吗？不能的！”“我们过去的清党只是把不良分子清出党外就完了，我们这次的清党是要进一步把共产党的

① 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年鉴（1934年）》第三编《组织》（丙）第61页。

② 梁寒操、肖次尹：《胡汉民先生》，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1辑《胡汉民先生纪念专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第31页。

死灰都要送还给俄罗斯，不能让它遗留在中国的。干脆地说，这次的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①在竭力宣传反共的同时，胡汉民将三民主义推至无比崇高的地位，并以此攻击共产主义，使之成为“清党”反共的理论武器。他在《三民主义之认识》一文中说：“世界上无论哪一派的革命主义，在理论上哪个能有三民主义完备？在实行上更没有哪个能够跳出三民主义的范围”；因为三民主义是“世界革命唯一最高最博大最适合的原则”，他进而极力贬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为共产主义定下的结论，是70年前就一时一国的经济现象所定的，已是陈腐不适用”了，只不过是“流行一时的旧古董”。^②这可谓胡汉民对三民主义态度的陡然转变。如前所述，孙中山在世时，尤其是国民党“一大”前后，胡汉民对三民主义的宣传，更多的是强调它的革命性，在1926年访苏期间他甚至认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③但“清党”以后，胡汉民则主要强调三民主义的“崭新博大”，并以此攻击共产主义。

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后，胡汉民不得不与之共进退。其后不久，1928年1月底胡汉民以赴亚非欧各国考察名义而出国，历时7个多月。后来胡汉民曾再度与蒋介石联合，出任立法院长，但其侧重点在确立国民党“以党治国”之体制。此后对三民主义解释的话语权基本上被蒋介石所垄断。

① 胡汉民：《清党的意义》，郎醒石编《革命与反革命》，上海民智书局，1928，第163页。

② 胡汉民：《三民主义之认识》，郎醒石编《革命与反革命》，上海民智书局，1928，第142～154页。

③ 须力求：《胡汉民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第223页。

(二) 蒋介石独揽三民主义的解释权

伴随着战场上的胜利，在一系列复杂的斗争中，蒋介石的地位逐渐稳固，并加速走上个人集权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翦除主义上的异己，独揽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解释权是其斗争策略之一。与此同时，这也是蒋介石打击与排斥共产主义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手法之一。

首先，确立孙中山三民主义为国家最高之根本法。

在1928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虽然取得了“正统”的地位，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统一国民党。自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和全国编遣会议以后，蒋介石在政治上排斥异己，军事上裁兵编遣，藉以削弱其他派系的武装实力，导致党内各派和各军事集团不断掀起反蒋政潮。为了反制党内异己派系的挑战，蒋介石充分利用了孙中山留下的主要政治遗产——三民主义。1929年3月21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孙中山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确立总理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举凡国家建设之规模，人权民权之根本原则与分际，政府权力与其组织之纲要，及行使政权之方法，皆须以总理遗教为依归。”^①显然，这一决议在孙中山主要遗教中抽掉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遗嘱》曰：“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

①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决议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91页。

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①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这一决议是对孙中山遗嘱的公开篡改。这也为此后蒋介石更加强硬地反共剿共扫清了主义上的障碍。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提出，“总理创造中国国民党，同时创造三民主义……总理生时，本党党员之努力，一以总理之言行为依规；总理既逝，则吾党同志之努力，一以总理全部遗教为准则。是故总理之全部教义，实为本党根本大法；凡党员之一切思想言论行动及实际政治工作，悉当以之为规范而不可逾越。”^② 从此，被蒋氏所篡改与诠释的所谓孙中山三民主义便成为统摄国民党一切成员的正统意识形态商标，并且具备了法源基础。

因此，蒋介石不仅垄断了对三民主义解释的话语权，而且不断利用三民主义商标，牟取政治利益。一方面，他利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权威，找到了统一党内各派的精神武器；另一方面，他还通过口头上继承与执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自我标榜，强化自己是孙中山忠实信徒的形象。1929年7月4日蒋介石在北平视察党务时发表《为什么要有党》的演讲，宣称：“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三民主义，若是离开了三民主义，这个人不仅不能救人，而且不能自救！所以我们的三民主义是如此宝贵。既然这等宝贵，如果要做一个人，而不懂得三民主义，那就枉生在世界上了。”^③ “现在这时代，是一个党的时代，是一个三民主义的时代，如果

① 孙中山：《遗嘱》，《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994页。

②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决议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二），第91页。

③ 蒋介石：《为什么要有党》，《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第557页。

我们在这个时代，离开了党和三民主义，再讲团体派别，那就是自取灭亡。”^① 后来，他又多次强调，“我们要做一个三民主义的信徒，为三民主义而死”^②。显然，蒋介石从国民党内的一名高级将领蹿升至孙中山的继承人，必须高举三民主义旗号，凸显正统与真传的包装，才能跃过从军人到政治家、理论家的形象差异，成为国民党新一代的领袖。

其次，独揽三民主义的解释权。

既然孙中山三民主义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并具备统摄全党全国人民思想行动的法律效力，蒋介石自然十分重视掌控与垄断三民主义的解释权，从而获得思想控制的有力武器。1928年7月18日蒋介石率北伐军入北平后，发表《中国建设之途径》的演讲，他说，“我敢断言，中国十五年以内，无论怎样好的政府，还不能造出很好的海陆军的。如果要想用军队和各帝国主义者对抗，来废除不平等条约，更是梦想了！我们现在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只有思想统一，意志团结，国里面没有内争，军队不能互相打仗，各团体、各阶级也不能互相争斗，大家为实行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奋斗，没有政府许可，不能罢工、罢课、游行”。^③ 显然，蒋介石试图谋求思想统一基础上的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并以此与共产党争夺思想阵地，排斥共产主义，并藉此强制全国民众停止罢工、罢课、游行，停止一切反抗，确保其政权的稳固。因此，凡是与蒋记三民主义不一致的言论与行为皆可划为异端，从而加以打击与取缔。

① 蒋介石：《为什么要有党》，《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第562页。

② 蒋介石：《军人精神教育之精义（三）》，张其昀主编《蒋总统集》第1册，（台北）“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8，第706页。

③ 蒋介石：《中国建设之途径》，张其昀主编《蒋总统集》第1册，第516页。

然而，当时的情况并不像蒋介石所希望的那样，全党全国思想完全在他所认可的三民主义旗帜下达成统一。蒋介石对此表示非常不满，首先表现在不满国民党内部的思想混乱。

蒋介石在《中国建设之途径》中指称，“（现在）就是同在三民主义之下，还有许多理论，自己任意解释，有的以为三民主义近于国家主义，有的以为三民主义近于共产主义，现在可说正是一个思想很纷杂的时代，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无所适从，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究竟是听哪一种说法好，究竟要怎样的制度才适合中国的需要”。^① 1928年8月11日，由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第三次正式会议也认为，“自总理逝世，迄至现在，党的革命理论，由同志凭各个对主义的认识，及革命实际变动的观察，致革命理论，纷歧万端。致理论中心不能建立。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则宣传不能统一，行动不能一致，力量不能集中”。^②

1929年3月5日蒋介石又一次将这样的不满诉诸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开幕词中说：“党内的根本弱点，是思想不统一，因为思想不统一，所以意志也就不能一致。因为意志不能一致，所以行动就不统一，团结就不坚固，因为行动不统一，团结不坚固，于是党的纠纷，都是从党员思想不统一而发生。”他进而严厉地批评党内其他人员“不根据三民主义去发挥本党的革命理论，而离开三民主义，自己任意发挥个人主观的见解，致使党内理论分歧，思想复杂”，他对此“当然不敢附和，亦不敢

① 蒋介石：《中国建设之途径》，张其昀主编《蒋总统集》第1册，（台北）“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8，第514页。

② 《中国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重要决议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54页。